



名人传记

# 一个作家的鲜活民间记忆史

新书秀场

□杨柳岸

路遥曾表达过对于他的作品他喜欢“下一个”，他的文学价值，更多的在于他的文学理想，在于他的精神追求。“纪事”体的精神实质是求真求实，是对真理的渴求。

作为一位特定时代，并超越了其时代的代表性作家，路遥已辞逝二十多年，而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陕西青年作家王刚先生新近付梓出版的这部《路遥年谱》，就是其中很有特色和价值的一部。

本书从路遥出生之年1949年到1992年逝世，从逝后的1993年到2019年底，共70年。路遥与共和国同龄，他的一生见证了共和国的第一个成长历程。书中所录的一些大的政治、文化事件，一些别的作家的文学事件，这些似乎与路遥并无直接关系，但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坐标系，让路遥的个体生命和文学价值融入到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里。如果说整个文学世界是一座森林，那么路遥就是其中一棵树。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历史是以人存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路遥年谱》是一本路遥故乡清涧、延川及陕北的地方文学文化史，是一部陕西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从陕西的一个作家来看中国的文学史。可以看出，也可想而知，作为一部特别的传记，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对材料的搜罗整理，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些内容从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了路遥，那些细节具有鲜活的文学性，有时往往只是当事



人的一句话，却具有广泛的文学性空间和意义。因此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个作家的鲜活民间记忆史，一个作家的精神影响史。

作家评论家公开见诸文字的对路遥的总体评价，见仁见智，繁多得难以一一罗列，而作者则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对那些材料删繁就简，力求简明扼要具有代表性。比如书中录有评论家李建军对路遥的高度评价，也录有评论家朱大可对路遥的批评。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

陈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的社会认识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作为一家之言，朱大可这段话当然有其可商榷处，其中不乏对路遥的苛评，比如“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从世俗眼光来看，这的确是“负面批评”，但总体而言他对路遥的评价是中肯客观的。而作为一个后辈和同乡的作家王刚来说，把这样尖锐的批评录入，是需要公正的文学眼光的。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之前，不轻下断语，尊重事实，保留更新认识不断学习的空间，这也是严谨认真的态度。可以说，正如路遥曾表达过对于他的作品他喜欢“下一个”，他的文学价值，更多的在于他的文学理想，在于他的精神追求。“纪事”体的精神实质是求真求实，是对真理的渴求。

身为晚辈和路遥同乡的作家王刚（笔名秦客），得以在文字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前辈作家曾经的精神苦旅，感受一个同乡作家留在这个世间的巨大的精神能量。青年作家王刚用一本书走近一个作家，用一本书感受一颗文学灵魂，与之交流文学与生命体验。他借以写这位他的同乡前辈，也算回顾了一下故乡的往昔岁月，也算做了一次精神回乡之旅。人一生能深刻地做一次精神回乡，这种机遇是不多的。可以说，真正的文学，是我们每一个作家共同的故乡。把文学构筑成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以犯罪悬疑的外壳探讨人与自然的话题。精通占星术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夫人雅尼娜，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她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比如“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



“一个人衰老的标志就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村上冷静书写父亲的整个人生，将自己与父亲漫长的隔阂、决裂与和解转换为文字，毫不避讳地告诉读者——父亲人生中经历过的动摇与恐惧，如今成为了他自己对世界的迷茫与不安。自我存在意义的认同、与世界的隔阂、承接家族历史的艰难，这些村上文学的根源问题也都在书中得到展现和解答。



2020年，新冠疫情、贸易战、Tiktok禁令等“黑天鹅”事件仿佛一面面放大镜，暴露出诸多问题，折射出我们对真实世界认知上的偏差。而这些偏差，与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推荐算法等导致人们处于各自的“信息茧房”有莫大关联。作者在本书中指出，深入理解技术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机理，突破信息茧房对视野和格局的限制，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看清全球治理秩序的演化方向，进而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



产后抑郁不只是妈妈的问题。马克·威廉姆斯的妻子在分娩期间发生意外，临时进行剖宫产手术，经历了漫长的担忧和恐惧过程的马克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多年来他一直默默忍受，近乎崩溃，在获得专业心理治疗后逐渐痊愈。随后，他发起了“国际父亲心理健康日”和“爸爸的援手”活动，旨在让人们更加关注父亲产后抑郁，强调所有新手父母都需要更多的渠道获取心理帮助方面的资源和有用的信息。

好看小说

# 在归零地，结一张品钦的网

□但汉松

一生酷爱猪仔玩具的品钦，想必应该看过《夏洛的网》。出生时抢不上母猪奶头而险些遭到农场主淘汰的小猪威尔伯，颇像是品钦笔下一直记挂的“弃民”原型，而三番五次从既定的末日厄运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张纤细而神奇的“网”。凭着在网上结出的神秘文字，“网”不仅成为乡民和观光客眼中的神迹，还传递出重申低贱生命之美的谕令。《致命尖端》(Bleeding Edge, 2013)也是一部关于“网”的小说，只是这张网不是蜘蛛的唾液结成的，而是虚拟的二进制代码、服务器、电脑终端和网线构成的隐匿赛博空间，如幽灵般悬挂在世贸中心遗址纪念公园的深井中。

这并不是品钦第一次在小说里“触网”。在前一部《性本恶》(Inherent Vice, 2009)中，私家侦探多克就通过友人的计算机实验室见识了“阿帕网”(即“因特网”的前身)。站在20世纪60年代的终结处，嬉皮士们隐约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园之门”正在开启，网络将引领人类的肉身去飞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药，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不同”。然而，品钦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网络时代的隐忧：“当年他们发现迷幻药能变成一个通道，让我们看见某些被他们禁止的东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这是禁药，还记得吗？信息跟这个不就是一码事吗？”

先进美好，却致命滴血，这正是当代社会所谓“血尖”技术的悖论。“网络”及其依附的人类数字化生存，由此成为品钦小说世界中像“火箭”一样重要的文学—科技母题。其实，以恶托邦的笔法来讽刺这个信息时代过度联结的互联网对人的异化，这在当代西方小说中并不鲜见，代表性的近作或许是大卫·艾格斯的《圆环》(The Circle, 2013)。艾格斯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硅谷那些科技巨头(如谷歌、脸书和苹果)的虚假节操，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的消失威胁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笃信“分享即关怀”的社交网络最终演变成一场全民狂欢的噩梦。相较之下，



品钦对于高速信息网络的态度则复杂含混得多，因为他深知互联网从诞生开始，就是两股迥异的历史力量交缠的产物。

一方面，“阿帕网”当然属于严格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五角大楼的军工产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联网实验室也携带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西海岸大学校园嬉皮士的自由因子。那些最早的网络冲浪者，将塑造一种“极客”亚文化，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打造出了“硅谷”，彻底改变了我们现代的生活面貌。事实上，构成因特网基石的TCP/IP协议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通信协议文化。如曼纽尔·卡斯特的著名《网络社会》中所言，它是“通过给予别人以及从别人那里获得而形成的协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它“从根本上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价值观，而要共享通信价值”。甚至如品钦在《葡萄园》(Vineland, 1990)里神秘展望的那样，赛博空间里的人类生活将是“无重量、无形状的电子在场与缺席的链条”，那一长串“0”和“1”表征了更高级的人类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里的来客”。

不过，这部《致命尖端》更像是网络时代的后现代启示录。小说以2001年春天的纽约开场，彼时穆罕默德·阿塔劫机小组成员尚未从迈阿密动身，《老友记》中瑞秋的造型依然是城里女性竞相效仿的时尚，华尔街的伯尼·麦

道夫仍旧是高级投资者口中最值得信赖的生财机器。但是，一种诡异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纽约人脑海中盘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虫”危机被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遥远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意味着什么，但纳斯达克的大崩盘却足以让曼哈顿“硅谷”的创业者在那个春天心惊胆寒。作为劫后余生的互联网创业者，小说里的电脑极客贾斯丁和卢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识到了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危机四伏。

尽管《万物引力之虹》中有过“万物皆有联结”这样的名句，但品钦却并非简单暗示“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致命尖端》与其他“9·11”小说最不同的叙事视角，乃是将新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灾难和世贸中心的灾难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宏大语境下。换言之，历史从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双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个无辜城市凭空招致的无妄之灾，也不仅仅是某个超级强国霸权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场不断持续的灾难堆积，将本雅明式的世界历史废墟又垒高了一寸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命尖端》并不是品钦写的第一部“9·11”小说。早在《反抗时间》(Against the Day, 2006)这部尚未译介的皇皇巨著中，品钦就以曲折的春秋笔法，将“后9·11”的历史之思投向了19世纪末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投向了在威尼斯屹立千年后突然倒塌的圣马可钟楼，投向了发生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品钦似乎习惯于从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历史运动轨迹中，审视人类社会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战祸、暴乱、冲突和坍塌，而“网络社会”或“9·11”不过是对这一连续体在当下阶段的最新命名。甚至可以说，品钦并不是心血来潮才决定在晚年写一部“9·11”小说，他毕生的文学创作都在预言这类“末日”事件的不断到来，他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与历史对抗的鬼魂从未真正退场，他们迟早会从边缘悄然越界，对现实的中心进行轰然一击。